



中俄关系通史

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黄定天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ISBN 978-7-207-07519-2



9 787207 075192 >

定价: 42.00 元

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中俄关系通史

黄定天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关系通史/黄定天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07-07519-2

I. 中... II. 黄... III. 中俄关系—
国际关系史—17世纪~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7170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姜海霞

封面设计:张 涛

中俄关系通史

Zhonge Guanxi Tongshi

黄定天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519-2/K·845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言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自建立直接关系至今的三个多世纪,可以分为 17 世纪末至 1917 年、1917 年至 1949 年、1949 年至 1991 年、1991 年至今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 19 世纪中叶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俄两国的初识、接触和建立国家关系的阶段。此时沙皇俄国虽然不断向东方扩张,但遇到的对手却是另一个封建大帝国——清王朝,所以沙皇俄国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侵扰和蚕食并未占到多大便宜,双方基本处于平等态势,两国关系在俄方主动中方被动的情况下建立起来。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以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璦琿条约》、《北京条约》为标志,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平等走向不平等,变为侵略压迫与被侵略被压迫关系。

第二个时期中俄两国由于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社会性质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权性质截然不同,致使双边关系呈波浪形发展,是最为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以 1937 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因两国国情的重大变化,双方经历了建交——断交——复交的曲折历程。从 1937 年开始,面对法西斯侵略的严重威胁,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因中国并存着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特殊情况,所以苏联采取了对华双重外交政策,游刃有余地与国共两党两个政权周旋。既从意识形态角度考量有分寸地支持了中共政权,又从国民政府那里确保了从沙皇政府时期就获取的在华权益,充分保障了本国的安全和利益。

第三个时期中苏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未像两国人民所愿望的那样结成长期的紧密同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虽然未曾断绝外交关系,却走过了同盟——分裂——对抗——缓和的戏剧性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与苏联全面友好合作建立了紧密同盟。60 和 70 年代两党两国间产生严重分歧,同盟关系很快破裂并迅速恶化,由全面对抗直至发生边界武装冲突。80 年代,由于两国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双方由对抗走向缓和,最终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

第四个时期由于苏联的解体,中苏关系实现了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这一过渡是理智与现实的。中俄两国关系也一步一个台阶地向更高层次迈进,经历了由“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平等信任

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阶段。中俄两国领导人妥善处理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终于进入了理性务实持续发展的新时期。

回顾三个多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可以用“曲折复杂大起大落恩恩怨怨大喜大悲”十六个字来概括,这是一段应当认真反思的历史。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中俄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专题研究和断代史两类。

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涉及到沙俄侵华、中俄界务、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苏外交、中苏论战、高层交往等领域。断代史著作大多是论述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这一时段中苏关系的,也有少量论述清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

与此同时,苏联(俄罗斯)和西方大国也出版了一批中俄关系的著作,中苏同盟与冲突是他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他则很少涉及。

除学术著作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少量通俗性著作。

从以上研究状况不难看出,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中俄关系的著作,但惟独缺少一部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通史性著作,这就是拙著撰写的初衷。应当说,随着中俄两国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化,双方交流的日益加强,特别是大批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刊布,已经具备了为世人提供一部通史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拙著研究的时间跨度太大,涉及范围又太广,本人有限的学识与精力实难胜任。加之又要在本课题立项时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以只能为广大读者奉献一部简明的通史,而且其中不当之处肯定很多,望各位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黄定天
2007 年元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俄两国的早期联系与通使	(1)
第一节 中俄两国的间接贸易和初识	(1)
第二节 明代中俄通使问题	(3)
第二章 从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到中俄东段边界的形成	(6)
第一节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及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6)
第二节 俄国遣使来华及雅克萨之战	(11)
第三节 尼布楚谈判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	(18)
第四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的中俄贸易	(23)
第三章 中俄中段边界的确定	(30)
第一节 《布连斯奇条约》与《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30)
第二节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中俄外交活动	(33)
第三节 俄国传教士团来华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	(42)
第四节 恰克图贸易	(50)
第四章 俄国再度入侵黑龙江流域与中国大片领土的丧失	(57)
第一节 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大举入侵与《璦琿条约》的签订	(57)
第二节 俄国全权代表使华与《天津条约》的签订	(62)
第三节 中俄北京谈判与《北京续增条约》的签订	(64)
第四节 1861 年和 1886 年的中俄勘界	(67)
第五章 中俄西段边界的变迁	(70)
第一节 俄国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占领与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70)
第二节 中俄塔城谈判与《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72)
第三节 伊犁问题及《改订条约》的签订	(73)

第四节	帕米尔问题与划界交涉	(77)
第六章	俄国出兵占领东北与策动外蒙古独立	(80)
第一节	俄国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态度及三国干涉还辽	(80)
第二节	俄法对华贷款与华俄道胜银行的建立	(83)
第三节	《中俄密约》的签订及中东铁路的修筑	(86)
第四节	俄国强租旅大及出兵占领东北	(89)
第五节	俄国觊觎西藏与策动外蒙古独立	(95)
第六节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俄贸易与文化交流	(100)
第七章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中苏关系	(104)
第一节	苏俄发表对华宣言, 远东共和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104)
第二节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奉俄协定》的签订	(107)
第三节	中东路事件与两国撤使	(109)
第四节	孙中山及南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	(112)
第五节	旅华俄国侨民问题	(114)
第八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118)
第一节	中苏外交关系的恢复与中东铁路的非法售让	(118)
第二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中苏两国的相互支持	(120)
第三节	中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124)
第九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	(130)
第一节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30)
第二节	苏军出兵东北, 苏联对华双重外交政策	(134)
第三节	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	(137)
第十章	新中国与苏联友好合作同盟的建立	(140)
第一节	毛泽东访苏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40)
第二节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144)
第三节	中苏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友好合作	(147)
第十一章	中苏两党论战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	(151)
第一节	中苏分歧的出现	(151)
第二节	从公开论战到全面对抗	(156)
第三节	中苏边界争端与谈判	(159)

第十二章	中苏关系从缓和走向正常化	(163)
第一节	中苏两国外政策的调整及两国关系缓慢发展	(163)
第二节	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正常化	(166)
第三节	中苏经贸关系的曲折道路	(171)
第十三章	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	(178)
第一节	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	(178)
第二节	中俄高层互访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179)
第三节	中俄经贸关系及教科文、军事领域的协作交流	(182)
第四节	中俄边界谈判与划定	(187)
附录一	中俄关系年表	(190)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76)

第一章 中俄两国的早期联系与通使

第一节 中俄两国的间接贸易和初识

历史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最初的联系往往始于两国间贸易的发生与发展,中俄两国同样如此,在正式交往之前,双方已经有了间接和直接的贸易联系。苏联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锦缎等商品,早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传入俄国。”^①此时的基辅罗斯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还不可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国商品应当是通过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里海北岸哈扎尔汗国的依的尔两个商品集散地转口贸易,间接进入基辅罗斯的。因为公元10世纪时,基辅罗斯已是东欧的一个强国,在它与东罗马帝国签订的条约中获得了相当优惠的贸易特权。与此同时,基辅罗斯又吞并了哈扎尔汗国,进而控制了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区。就地域而言,已与东罗马帝国近在咫尺,这样就为中国商品经由古老的丝绸之路大批的、甚至是直接的进入基辅罗斯创造了便利条件。

公元13—15世纪,连接欧亚两洲的中亚地区各汗国先后形成了几个国际性的商品集散中心,这些汗国有大批专门从事中介贸易的商队,穿梭于欧亚各国之间,也吸引了欧亚各国的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进行商品交易。由于俄国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欲望越来越强烈,因而“希瓦和布哈拉商人们借此把东方各国,其中包括中国的各种各样货物运抵阿斯特拉罕,并进而沿伏尔加河运抵俄国各中心城市”^②。于是,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国市场上。据15世纪初滞留撒马尔罕两年之久的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记载,当地市场上“由支那运来丝货,美丽非凡,尤以绸缎为最。又麝香一物,世界他处绝无。红玉、钻石、珍珠、大黄等物,亦皆来自支那。支那货物,在撒马尔罕者,最良且最为人宝贵”^③。在16世纪末的商业税册中“记载有一种被称为‘中国布’的织物”^④,甚至在“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1557年的行军服登记单之中,也列有用中国黄缎缝制的无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莫斯科,1974年版,第43页。

② 同上。

③ 张星娘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6页。

④ 菲赫涅尔:《16世纪俄国与东方各国的贸易》,莫斯科,1956年版,第75.76页。

领袍”^①。

中国之富足,中国商品之精湛,加之各地商人关于中国的各种传闻,使得俄国朝野人士产生了极大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伊凡四世甚至不惜以重金悬赏开辟通往中国的道路。^②但是,此时中俄两国并不接壤,新商路的开通并非易事,直至16世纪末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与中国厄鲁特蒙古各部领地接壤后,两国商民才不必借助于布哈拉等地商人的中介贸易,开始了直接的经常的双边贸易。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上讲,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元9世纪下半叶基辅罗斯建立时,相距遥远的中俄两国尚不具备直接进行文化交流的条件。直至13世纪初,蒙古大军的西征和钦察汗国的建立,才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开通了渠道。而在此之前,虽然屡有汉代文物在现今俄罗斯人居住地出土的报告,但只是偶然的和单向的,如果据此认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始于汉代,显然论据不够充分。

蒙古大军西征时,携带着大批来自中国内地的书吏、工匠、艺人、歌舞伎,蒙古人在成为俄罗斯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去了东方文化。精美的中国器物 and 服饰深受俄罗斯封建上层人士的喜爱,他们不但争相使用穿戴还用东方语言来称呼,还喜欢饮用中国茶,甚至学会了使用算盘来记账。特别是中国的印刷术,很可能是先传至俄罗斯,再由俄罗斯人西传至欧洲的。^③总之,元代拉开了中俄直接进行文化交流的序幕。

经过中俄两国先民长期断断续续和间接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相互之间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俄国人模糊地知道,在他们的东方,有一个称为“中国”的国家存在。如果乘海船需4个月到达,如果走陆路经过印度6个月可到达。“那里制造瓷器,且东西都很便宜。”^④从现已掌握的资料看,“中国”一词见诸俄国史籍是在莫斯科公国《索菲娅第二编年史》中,记述1395年,帖木儿帝国大举扩张时被征服的国家与地区中,首次出现了 Китай(中国)一词^⑤,这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契丹”一词的音译。

公元10—12世纪,由契丹人为主建立的辽王朝,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林东之间)为首都四面扩张,疆域相当辽阔。南逾鸭绿江、长城和大戈壁,北达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东濒太平洋,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控制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当辽朝兵败于北宋与金朝的联盟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耶

① 菲赫涅尔:《16世纪俄国与东方各国的贸易》,莫斯科,1956年版,第75、76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莫斯科,1974年版,第54页。

③ 见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④ 尼基京:《三海航行记》;见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版,第15页。

⑤ 《索菲娅第二编年史》,载《编年史大全》第6卷,圣彼得堡,1853年版,第125页。

律大石率部西迁西域、中亚,建立了一个南至阿姆河,北越巴尔喀什湖,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以北,面积不下400万平方公里的西辽政权。他们自称契丹,而且契丹的名声远播西域中亚,所以当时欧亚很多国家和地区把西辽,甚至西辽先人统治过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统称为“契丹”。此后,在中国西北方向上的一些国家,将“契丹”一词的内涵由中国北部扩大到了整个中国。

中国史籍最初关于俄罗斯的记载见诸《蒙古秘史》和《元史》。《蒙古秘史》中称俄罗斯为“斡鲁速惕”,《元史》中称俄罗斯为“斡罗思”,有时也称“斡罗斯”、“兀罗思”、“兀鲁思”、“阿罗思”。《元史》中有几处诸王向朝廷进献数千斡罗思人的记载,朝廷也妥善安置了这些人。如:《元史·文宗本纪三》和《元史·文宗本纪四》所载:“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百三十余顷赐之。”“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给牛、种、农具。”“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诸指挥使司,赐银印。”^①

然而,这一时期中俄两国无论是文化关系,抑或贸易关系,都是在蒙古帝国的框架下产生的,也是蒙古帝国西征的飓风狂扫亚欧大陆的副产品。这毕竟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交流,所以当庞大的蒙古帝国一崩溃,这种交流也就戛然而止,致使从公元14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即几乎整个明代,中俄两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明代的典籍中也再无有关俄罗斯移民的记载。当17世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清王朝和跨越乌拉尔山脉迅速向东推进、并不断撞击中国北大门的俄罗斯人成为近邻时,两国几乎是从零起点重新开始了双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第二节 明代中俄通使问题

如前所述,伊凡四世曾悬赏开通赴中国的道路,为此俄国政府做出了不少努力,虽无人到过中国的京城——北京,但屡屡与中国蒙古各部发生频繁的接触。俄国使节何时跨越辽阔的蒙古草原抵达北京,与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接触,由于中俄两国的史料不详无从引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外著述中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1567年俄国政府派遣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使团出使北京。”此二人抵达北京后与明朝官员曾有交往,还参观了北京市容。彼得罗夫回国后提供的出使报告对此行有详细记载,“且称穆宗曾传谕彼等,非进贡方物,不得朝见”^②。实际上,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为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金。在卡拉姆金的说法风行一时后,不少学者特

① 见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 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第16页。

别是俄苏的一些历史学家如特鲁谢维奇和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以及一些中国学家如米亚斯尼科夫和杰米多娃等人均提出了异议,并依据档案文献证明“1567彼得罗夫北京之行”纯属虚构。但也有些著名学者如斯拉德科夫斯基坚持笃信卡拉姆金的说法。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完全否认这一说法,认为彼得罗夫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他从未到过北京。卡拉姆金等人所依据的彼得罗夫出使报告与后来1618—1620年彼特林使团出使报告的内容完全相同,报告谈到的旅途见闻与17世纪初的历史情况恰恰相符,而不符合16世纪60年代的情况,因而是后人张冠李戴,把人名和年代都弄错了^①。这就与上述米亚斯尼科夫和杰米多娃等人的见解相同。

虽然排除了彼得罗夫使团抵达北京的可能性,但俄国政府坚持不懈地谋求与“大明汗”直接交往却是不争的事实。在17世纪初,有据可查的就有两次,这两次任务由与中国邻近的托木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的军政长官来实施。第一次是奉沙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之命,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西卡·沃伦斯基于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派人前往中国,他挑选了哥萨克骑兵伊凡·别洛戈洛夫等人担此重任。但别洛戈洛夫行进途中,因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开战受阻,只得原路返回。他们返回后向俄国政府报告了在蒙古部落了解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从阿勒坛皇帝(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的硕垒乌把什珲台吉)那里到中国要走三个月。……中国君主皇宫中的殿堂也是石筑的。……中国君主的武器是火器。据说常有人由各地到那里去做买卖,他们平时穿的都是绣金的衣服,他们把各地各种贵重的装饰品运到他那里。”^②第二次是托博尔斯克督军伊·谢·库拉金于1616年奉命派遣哥萨克首领瓦西里·丘缅涅茨和十人长伊凡·彼得罗夫为信使,分别出使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他们在蒙古地区探听到关于中国的情况与伊凡·别洛戈洛夫等人探听到的大体相同,并向俄国政府准确地报告了“中国皇帝的名字叫做大明”^③。俄国在不断派人探路寻访的基础上,派遣专使进入北京直接与明朝政府交往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沙皇俄国的使团抵达北京是在1618年,这一年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凡·彼特林率团出使中国。彼特林曾在托博尔斯克任地方语言的“通译”,又被选入赴中国的勘察队,后经托博尔斯克督军伊·谢·库拉金推荐和外务衙门的考查,经沙皇同意出使中国。因托博尔斯克距中国不远,彼特林5月出发,在穿越蒙古草原时又得到沿途各蒙古汗国王公在向导、车马、粮秣、护卫等各方面的鼎力协助,所以9月初即到达北京。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

②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8页。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1页。

彼特林在北京没能觐见万历皇帝,据彼特林本人讲,“我们没有到过大明皇帝那里,没有见到皇帝本人,因为没有带东西去送皇帝。外务衙门秘书官对我们说:我国礼仪是,没有带礼品来的,不能觐见我大明皇帝。……现在我皇帝只能托你们带一封国书转交你国沙皇。”^①其实彼特林除未准备礼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疏漏,即未能提交沙皇签署的国书。按照明朝的礼仪,皇帝当然不能接见这样一个既无表文,又无贡物,来历和身份都不明确的使臣。因而彼特林在北京仅逗留了短短的4天便返回俄国。根据彼特林的自述,他虽然未携带沙皇致大明皇帝的国书,却得到了一封大明皇帝致沙皇的国书。然而这封国书因俄国无人能翻译被搁置一旁,所以未能及时了解这封国书的内容,以至后人在这封国书的真伪争论不休,成为早期中俄交往的一桩悬案。甚至有人对彼特林曾出使过中国、到达过北京也产生了怀疑。现今俄苏的历史档案中保存有彼特林撰写的《见闻录》(全称为《中国、腊宾国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大鄂毕河流和道路的见闻录》),该《见闻录》所记载的社会习俗、人物活动与17世纪初的情况基本吻合,尤其是他对沿途景物的记载相当准确细致,以致后人对他的这次出行不容置疑。问题的症结在于他带回的那封“大明皇帝致沙皇的国书”。由于当时俄国无人通晓中国文字未能及时翻译,像天书一样而被束之高阁,直至数十年后的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尼·加·斯帕法里受沙皇派遣出使中国时,才带至北京(还有另一封汉文文书)设法弄清其内容。斯帕法里到北京后,经清朝官员阅读,这两封汉文文书是明成祖永乐年间“颁赐给驻黑龙江大臣的任命诏书”,根本不是什么国书,此文书经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南怀仁译成拉丁文交给斯帕法里阅后也得到佐证。巧的是这两封汉文文书以及拉丁文译件在斯帕法里回国途中统统丢失了。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明皇帝致沙皇的国书”是俄文译件,据记载是斯帕法里在赴中国途中经过托博尔斯克时,找到一名居住于此的中国人将其译成俄文,先期寄回俄国外务衙门留存下来的。对这封俄文译件,中外不少学者从明朝的御礼常规、对外政策以及国书的体例等几个方面认定是伪造的。当然也有人估计是在保管、交接、翻译等环节上出现错误而导致风马牛不相及。总之,既未持有沙皇的国书,带回的明朝国书又证据不足的彼特林还不能说完成了俄国首次对华外交的使命,当然也就不能给他戴上中俄两国外交关系的开拓者这项桂冠。因而,自明代起中俄两国已正式通使的说法也就很难成立。

^① 转引自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中俄关系通史 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第二章 从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 到中俄东段边界的形成

第一节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及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西伯利亚这一地理概念在 16 世纪之前,指的是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后来才将西起乌拉尔山、东到白令海峡、北濒北冰洋、南接中蒙的大约 1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称为西伯利亚。有 30 多个小民族世代劳动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汗特人和曼西人、谢尔库善人和开特人;东北部居住着古亚细亚人,即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西部和南部居住着突厥人,即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黑龙江流域居住着达斡尔人、赫哲人和费雅咯人,勒拿河流域居住着雅库特人,安加拉河流域居住着布里亚特人,在西起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通古斯人。^①

在俄国侵入西伯利亚之前,没有斯拉夫人在此居住,但他们与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汗国早有往来。西伯利亚汗国以牧业和农耕为主,经济尚不发达,但这里的黑貂、水獭、旱獭、狐狸、灰鼠等珍贵软毛皮,享誉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丰富的银矿、铁矿等资源。加之这里又是通向东欧、中亚和中国的必经之处,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深得俄国政府的垂涎。当俄国于 16 世纪 50 年代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便积极策划以武力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然而,此时俄国正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全力以赴进行立窝尼亚战争,兵源奇缺,国库空虚,根本无力东征,只好借助于领地与西伯利亚汗国毗邻又宿有积怨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是俄国贵族,屈指可数的封建大领主,沙皇政府为使这个家族竭尽全力完成其宿愿,不但授予这个家族拥有制造使用武器、自由招募炮手和火枪手、雇佣防御人员的特权,还别有用心地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又将托博尔河流域的全部土地都赐给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1574 年,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受沙皇的正式指派,以武力征讨西伯利亚汗国,从此揭开了俄国大规模长时期向东

^① 见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 页。

扩张的序幕。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虽然乐意为俄国东侵充当先锋,但也深知光靠现有人马还力不从心,于是又四处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此外还需要一个敢于冲锋陷阵的亡命徒,自然想到了长期流窜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叶尔马克此时虽为俄国政府严令通缉的逃犯,但他心狠手黑勇猛过人,是向东扩张打头阵的理想人选,于是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派人携带厚礼请叶尔马克入伙。叶尔马克经过盘算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一来不仅能赦免此前一切罪行,还有可能发大财,他欣然接受邀请,率其党羽500余人投奔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麾下。

1581年9月10日(俄历9月1日),叶尔马克率领配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备以及向导和通译,总数为840名哥萨克官兵的远征军向东进发。翌年春,远征军拿下了西伯利亚汗国重镇奇姆基,夏季占领了汗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卡拉恰城堡,秋冬之际又攻陷了京城伊斯凯尔。叶尔马克的远征军虽然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的大部分领土,但库楚姆汗和王子仍然在南部集结兵力伺机反击。1584年夏,叶尔马克率军前往征讨,在瓦盖河畔遭到库楚姆汗军队的袭击,俄军全军覆没,叶尔马克也在慌乱中失足溺水身亡。虽然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不过三年即丧命战场,但他在征战中击败了汗国的主力,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为日后俄国彻底征服西伯利亚汗国铺平了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末代蒙古汗王库楚姆被叶尔马克击败了,这就为亚洲俄罗斯奠定了基础。”^①叶尔马克对俄国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沙皇追封他为军役大贵族,授予西伯利亚公爵的头衔。

从1586年—1596年的十年间,俄国军队在新攻占的西西伯利亚开山垦殖,建筑城堡,先后建成了秋明新城、托博尔斯克、别廖佐夫、苏尔古特、塔拉、纳雷姆。1598年又再次进攻库楚姆汗驻地,实力相差悬殊的库楚姆汗败走南部草原,不久死去,西伯利亚汗国至此灭亡。俄军前后历时17载终于打通了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从此北亚广袤无垠的大地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俄国人面前。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奔向鄂毕河以东的叶尼塞河流域、勒拿河流域、贝加尔湖地区。

叶尼塞河在中国的史籍中称为剑河或谦河,居住在上游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布鲁特人)、蒙古人均受中国政府管辖。^②俄国人在16世纪中叶以前还不知道有条叶尼塞河,在占领鄂毕河后才知道东方还有一条大河,于是频繁派人到叶尼塞河下游一带进行侦察,待得到较为确切的情报和探明了道路之后,于17世纪初向这里进军并很快占领了这一地区。他们先在下流构筑了曼加结亚城和土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116页。

② 见《新唐书》,卷二一七,《元史》,地理志,六。

汉斯克城,又以此为据点向中游和上游进发。俄军于1619年在叶尼塞河西岸克姆河口处构筑了叶尼塞斯克城,将督军官府设置于此。不久又在卡恰河畔和安加拉河口不远处构筑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和雷宾斯克堡,这两座城堡和叶尼塞斯克城成为日后俄军入侵贝加尔湖地区 and 黑龙江流域的基地。俄国人占据了叶尼塞河后又从布里亚特人那里听说了再向东还有一条大河——勒拿河,于是又乘势向东挺进,组织了多次对勒拿河流域的远征,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占领了这片土地,于1632年在勒拿河中游雅库次克建立了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督军辖区。至此,俄国人已把西伯利亚的鄂毕、叶尼塞、勒拿三大水系及其辽阔的流域牢牢掌握在手中。

俄国人在占领了上述辽阔的土地后并未满足,又以勒拿河为基地继续向亚洲东北部挺进。亚洲东北部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均比上述三大河流域恶劣得多,人类文明与开发程度也差得多,但俄国哥萨克不避艰险,于1639年由伊凡·莫斯科维京率队东进至鄂霍茨克海边,并于1649年构建了鄂霍茨克堡,标志着俄国势力已达到太平洋沿岸。这样,从叶尔马克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至1639年莫斯科维京到达鄂霍茨克海边,俄国人仅仅用了短短58年的时间,便基本上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后又经过长达百年的反复较量,至18世纪中叶时终于将这一地区并入了俄国的版图,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世界第一大国。

俄国人在不断东进的同时也积极南下,当俄军进驻叶尼塞河流域尚未完全控制该地区时,就派人进入叶尼塞河流上游的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一带刺探情报以便日后兼并。贝加尔湖地区是以该湖为中心,包括了安加拉河、勒拿河上游及其支流维季姆河、南部的色楞格河、东部的黑龙江上游鄂嫩河及音果达河等多条水系。贝加尔湖地区本属中国管辖,贝加尔湖在中国史籍中称为“北海”,贝加尔便由北海一词转音而来。据《新唐书》载,公元662年,此地建余吾州,隶翰海都督府,后分设燕然都护府,府下又设州。在贝加尔湖以北地区设玄阙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设虫龙州;贝加尔湖以南地区设仙萼州。^①居住于此的主要是骨利干部,此外还有乌桓部和拔野古部等。17世纪时,这里居住着蒙古族各部,其西部是吉尔吉斯人,东部是达斡尔人。元明清历朝均对此地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俄国毫不顾忌世代居住于此的各民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以叶尼塞斯克城为根据地,从西面和北面侵入贝加尔湖地区,在17世纪中叶彻底征服了布里亚特蒙古人,此后又派兵侵入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沿湖边建筑了一些城堡和据点。1654年在尼布楚河口构筑尼布楚城(即涅尔琴斯克),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公然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了任命阿法纳西·帕什科夫为“达斡尔

^① 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卷二一五(上);亦见《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